



死者关怀和失踪人员搜寻 的法医学应用： 莫里斯·蒂德博尔- 宾兹博士访谈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失踪人员项目法医经理*

莫里斯·蒂德博尔-宾兹 (Morris Tidball-Binz) 博士是一名法医。自2004年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之后，他就在大量国家和地区开展行动，帮助发展委员会的创新性法医能力。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医和人权组织。基于相关工作经验，他帮助在自己的故乡南美洲开创性地将法医学应用于人权调查中，特别是应用于失踪人员的搜寻中。他还协助创立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医部门，并担任第一任主任，直至2017年初卸任；此后他又在人道项目计划中担任法医工作的负责人。目前，他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新的失踪人员项目中担任法医经理一职。他与《红十字国际评论》分享了相关见解，探讨人道法医行动的发展，及其在保护死者、澄清失踪人员下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 莫里斯·蒂德博尔-宾兹博士谨以此次采访纪念五月广场祖母协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玛丽亚·伊莎贝尔·乔罗比克·德马里亚尼 (María Isabel Chorobik de Mariani)。她于2018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4岁。她是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是她看到了法医学在搜寻失踪人员方面的价值，并推动了世界上首批运用法医学的失踪人员调查。本次采访由《红十字国际评论》执行编辑埃伦·波利辛斯基 (Ellen Policinski) 和专题编辑约瓦娜·库兹曼诺维奇 (Jovana Kuzmanovic) 于2018年1月16日在日内瓦进行。

关键词：失踪人员、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法医学、死者、死者管理、人道项目计划。

.....

“人道法医行动”的概念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系指出于人道目的，而非犯罪目的，利用法医学满足武装冲突和其他灾难受害者需求的行动。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医服务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向地方当局和法医从业人员提供建议、支持和培训，帮助他们搜寻、找回、分析因武装冲突、灾难和迁移而死亡之人的遗体，辨认其身份，进行遗体管理，并建设当地的法医能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如缺少其他法医参与方，法医服务部门还会开展遗体找回和身份辨认行动等法医工作。人道法医行动旨在确保妥善管理死者遗体，保有死者尊严；预防失踪，处理失踪人员问题；并为悲痛的家属查明实情，帮助他们实现对亲人命运和下落的知情权。

当人们在武装冲突、灾害或迁移过程中死亡时，他们的遗体必须得到妥善的处理，并保有尊严。必须搜寻、找回他们的遗体，并进行身份辨认。人类学、考古学、病理学、指纹分析、牙医学和遗传学(包括法医DNA分析)等法医学科目，有助于确保开展专业的死者遗体管理和记录，保有死者的尊严，还有助于就失踪人员的命运和身份提供客观的信息，无论他们是否在世。

多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法医领域的专业技能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事实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唯一一个仅出于人道目的提供法医援助的组织。尽管如此，将法医学应用于人道目的(包括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仍是相对较新的尝试，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在武装冲突期间和战火刚刚平息之时，搜寻失踪人员往往是最为迫切的一项需求，但实际上却很少作为重

**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一词并不代表本刊对该地区法律地位或其边界或界线划定表示官方认可，或表达任何意见。两个名称一同使用，并按字母顺序排列。

1 See Stephen Corder and Morris Tidball-Binz, “Humanitarian Forensic Action – Its Origins and Future”,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Vol. 279, 2017.

点工作得以开展。这是因为法医调查需要大量财力和人力资源，而在冲突或其他灾害的余波之下，这些资源常常无法即刻获得。此外，在人道背景下的法医调查中，医务人员等从业人员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他们可能会成为威胁和袭击的目标，还可能在开展工作期间遇到其他危险，如接触战争遗留爆炸物等。因此，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所需法医知识、技能、程序和工具，以应对人道行动带来的特殊挑战。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吗？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从事法医工作呢？

其实这完全是一场巧合。1984年时，我还是一名医学生，在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学习和生活。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来访的外国法医学专家代表团，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帮助失踪人员家属查明相关情况。这些家属向专家提出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有一名儿童遭到绑架时还是婴儿，其父母也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否辨认这名儿童的身份。第二，有大量人员失踪，人们认为这些人员已遭到杀害，且遗体埋葬在秘密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否找回他们的遗体，并凭借白骨化的遗体辨认其身份。这个法医学专家代表团是在新当选的民主政府于1983年12月正式执政后，应失踪人员家属的请求来到阿根廷的，为了帮助家属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换言之，正是因为这些失踪人员家属富有远见，积极推动，法医学才得到了开创性的发展。

这些外国法医专家接到邀请，是由于部分失踪人员家属不信任当时阿根廷既有的法医系统。事实上，阿根廷法医界的许多人员都遭到质疑，后来也的确证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国家机器的工具，造成了人员的失踪——例如，他们会为被处决人员签署虚假死亡证明，声称这些人死于意外事故或死因不详。因此，失踪人员家属完全不信任本国法医官员，但相信自己求援的外国专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作为一名医学生，受邀协助这个代表团开展工作，是因为我得到了家属的信任，熟悉医学术语，又具备必要的医疗技能。而且我能说英语，可以扮演翻译的角色。我的主要任务是召集一些值得信赖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学生自愿组成团队，帮助专家完成这项工

作。事实上，这是针对阿根廷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的首次独立法医调查。尽管当时我还在医学院读书，有其他工作要做，但我仍然接受了这次邀请，因为我同时也致力于人权事业的发展。我在那时已经有几年时间投身于新兴的人权运动，工作之一就是帮助失踪人员的家属找寻亲人。

我不是天生就擅长法医学。相反，我在医学院的成绩比较出色，迫切希望专攻公共卫生和家庭医学，学成后在农村地区工作。我从未想过要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奉献给法医学——这个当时在医学科学领域里的冷门学科。然而，一见到这些杰出的法医学家，并帮助他们在阿根廷以他们的方式开展了第一次法医调查之后，我就深深地迷上了这个专业。这项工作告一段落以后，我召集了之前提供协助的部分同事与我一道组建了一个团队，继续提供志愿服务，专门致力于这种新兴的法医活动。那时，没有任何人想过要收取费用。我们都是只能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之外，在周末和假期来开展这些工作，以满足当时对独立法医专业技能的巨大需求。

我们很早就受邀开展此类工作。邀请我们的是有史以来首批成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之一——阿根廷失踪人员全国委员会。当时有失踪人员家属急于知道亲人的下落和命运，于是该组织应家属的要求请我们协助。

如何找到失踪人员这个问题已经探讨很长时间了。作为人权活动人士，我们对此并没有答案，但我们怀疑某些失踪人员被埋葬在了公共墓地的无名墓中。然而，要想对此采取任何行动是非常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政权会进行大力镇压。

当外国法医学家代表团来到阿根廷时，法医学知识已经发展成熟，能够应用于此类调查之中。事实上，这也是法医学第一次用于这样的目的。同时，当时的背景情况是，有些当局为寻找失踪人员，已下令在墓地进行大规模发掘，且行动仓促。这导致遗体 and 证据均遭到破坏，对死者家属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引发大量媒体关注，成为当时人尽皆知的“恐怖秀”。²当局实际上出动了推土机，挖出大量尸骨，毫不尊重死者，而且遗体也遭到公

2 See Cora Gamarnik, “Imágenes de la post-dictadura Argentina”, *Artelogie*, No. 7, 2015, available at: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artelogie/1072> (all internet references were accessed in May 2018).

然破坏，造成这些遗体的身份永远无法得以确认。这是对死者、死者家属、乃至整个社会的巨大侮辱。因此，社会大众发出强烈呼吁，迫切需要停止这种做法，并采取专业科学的调查方法。这里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在那个时代，法医人类学仍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科学领域，除在美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外，几乎不为人知。所以，人们不会想到要将这门学科运用到此类大规模调查中。直到多年以后，以法医犯罪现场调查为主题的电视剧才走进银幕，让法医学成为一种潮流。

我还曾受到五月广场祖母协会的邀请，协助这些祖母寻找她们失踪的孙辈。这是一个1977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³同样也在邀请外国法医学家的失踪人员家属之列。该协会基于祖孙隔代亲权鉴定这一极具开创性的高明理念协助搜寻工作。这就要求将标准的法医亲子鉴定调整为祖孙隔代亲权鉴定。前者是在法庭上用来确定一名儿童是否与推定的父亲存在生物亲缘关系；后者则是要对比祖父母和一名可能是其孙辈的儿童的血样。在那时，法医DNA检测都尚未诞生，此类分析在法医实践中更是没有任何先例，所以当五月广场祖母协会第一次向一些科学家提出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时，遭到了科学家的拒绝。然而，有其他人看到了这一想法的可取之处，开展了必要的研究，慢慢地开始形成了新的鉴定程序。⁴我受邀加入了他们新组建的法医遗传学团队，最终于1987年创建了史上首个用于确认失踪人员身份的国家遗传数据库。⁵

1984年，阿根廷的法院首次成功运用了这种革命性的祖孙隔代亲权鉴定。根据鉴定结果，一名失踪年轻女孩的身份得到确认，得以回到原来的家庭，回到祖父母身边，而此时距离她父母失踪已时隔多年。这名女孩尚在襁褓之中，就与父母一同遭到绑架，并被一名行刑队队员带走，而该行刑队对她父母后续失踪，并遭遇谋杀也负有责任。多年后，五月广场祖母协会解救

3 See: <https://abuelas.org.ar/idiomas/english/history.htm>.

4 Jorge Luis Berra, Norberto Liwski, Diana Grinspon and Morris Tidball-Binz, "A National Bank for Genetic Data of Disappeared Children in Argentina: Task Up to 2050", *Advances in Forensic Haemogenetics series*, 1986, available at: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642-73330-7_120.

5 See "Historia del BNDG", available at: www.argentina.gob.ar/ciencia/bndg/historia.

出这名女孩并在法庭上成功证实了她的身份。后来，这名女孩继续学习生物学并成为了一名遗传学家，与五月广场祖母协会合作，协助辨认其他失踪儿童的身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祖母都始终被视作真正的杰出女性。能够有机会为她们工作，我深感幸运和荣幸。正如我前面所提及的，在我看来，人道法医行动能够实现早期发展，要完全归功于这个协会。

在为五月广场祖母协会工作期间，我依然与早期团队的朋友和同事们一起针对失踪人员继续开展法医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我们于1987年5月正式成立了有史以来首个专门从事此类工作的非政府组织——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团队。⁶该团队的工作得到了五月广场祖母协会和部分1984年来访阿根廷的法医专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克莱德·斯诺 (Clyde Snow)，为我们提供了持续的培训和专业建议。实际上，斯诺博士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守护神”，我认为团队得以存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支持。我受邀担任该团队的首任负责人，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医学事业，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法医学在人权调查中的应用这一领域。

1990年，我离开阿根廷到国际特赦组织工作，担任伦敦总秘书处的研究员一职。虽然这项工作并不会主要运用到我的法医技能，但事实证明，在针对侵犯人权的指控进行循证调查、对酷刑幸存者进行检查、探视拘留场所和指导失踪人员案件调查等过程中，我的法医技能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借当时居住在伦敦的机会，继续进行用于记录侵犯人权行为的法医学研究并帮助进一步发展这一领域。⁷与此同时，我还参与了部分寻找巴尔干战争失踪人员的首批法医调查。⁸

6 见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团队官网：www.eaaf.org。

7 See, for example, Duncan Forrest, Bernard Knight and Morris Tidball-Binz, “The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in *A Glimpse of Hell: Reports on Torture Worldwide*, Cassell, London, 1996.

8 Morris Tidball-Binz, “Forensic Investigation of Alleged War Crime near Vukovar”, *The Lancet*, Vol. 341, 1993, p. 625.

您是首批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法医专家之一。您是怎样加入了这个组织呢？与其他组织相比，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事法医工作有何特别之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3年聘请了首位法医专家——来自澳大利亚的斯蒂芬·科德纳 (Stephen Cordner) 教授。他是维多利亚州法医学院院长，当时正处于学术休假期。他的任务是跟进2003年“失踪人员及其家属”国际大会提出的建议，特别是与法医学有关的建议，并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未来在法医学方面的发展方向提出初步建议。为此，他在返回墨尔本继续担任院长之前，前往伊拉克和巴尔干地区等地执行了几次一线任务，并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更多法医活动制定了基本框架。当时，我正在总部位于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担任主任一职。虽然该组织的活动与法医学无关，但由于它致力于制定国际人权标准和机制，并培训人权活动人士在世界各地实施这些标准和机制，所以我们也帮助促进了法医学在联合国人权相关程序中的应用。碰巧的是，200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邀请我参加2003年“失踪人员及其家属”国际大会的前期筹备研讨会。另外，我也参加了2003年的国际大会。2003年秋，科德纳教授和同样积极参与大会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外科医生罗宾·库普兰 (Robin Coupland) 邀请我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进午餐。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在午饭时邀请我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担任首位法医主管。当时我心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什么需要我的法医技能呢？然而，几经犹豫之后，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并于2004年2月开始正式为委员会工作。尽管从事这项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依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好的一个决定。

与我之前从事过的人权活动相比，在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时，有许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在其他组织或机构中，大多数运用在类似工作中的法医专业技能最终都旨在为刑事侦查和审判程序提供可靠证据。例如，这其中包括确定疑案中人员死亡的原因和方式，或证明诸如酷刑、性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身体虐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以及收集犯罪者的证据。然而，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中，法医学主要用于人道目的，而不是确定刑事责

任。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运用法医学预防失踪，并处理失踪人员案例；在条件非常恶劣的环境和情况下妥善搜寻并找回死者遗体；保护死者尊严并帮助辨别他们的身份；还向家属告知他们逝去亲人的命运和下落。为确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开展人道行动的专业性，这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恰恰只有法医学可以提供。尽管如今看来这不言而喻，但在2004年，却没有多少人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因此，我初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就面临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挑战：如何证明法医学对委员会开展的一线行动有所助益。在人道工作中运用法医学的独特之处在于，法医学就像一个装满了工具和知识的百宝箱，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助于开展严格意义上的人道工作，特别是（但不限于）与死者有关的工作，而且往往还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应对与死者有关的问题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职责之一，而武装冲突几乎总是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明确规定应保护死者及其尊严，要求妥善找回死者遗体，进行记录、辨认其身份，并妥善安葬。这种认识绝非全新概念；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就早早地认识到死者也有其权利，因此他发起运动，希望能够采取措施确保死者的身份得到辨认。⁹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意识到，只有运用法医学才能确保以专业的方式履行对死者的义务。

因此，我很早就开始前往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以及其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处理失踪人员案例方面遇到诸多挑战的地区开展法医工作，力图向在一线工作的同事证明法医学的价值所在。就如何改善死者管理而言，我提出了很多问题与想法。很快，同事们（特别是在一线工作的同事们）就意识到法医专业技能对于委员会开展的死者和失踪人员相关行动的确大有裨益。如今，我相信，无论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是其他组织或机构的大多数人，都已将法医学视为开展人道行动的重要工具，对逝者和生者而言都是如此。因为法医学可以为死者家属及其所在社区带来真相，减轻他们的痛苦。而且，通过帮助履行对死者的义务，我们也重申了人道。此外，法医能力经过多年

9 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亨利·杜南探望并安慰了被带到巴黎的伤者，并提议佩戴徽章，以便辨认死者身份。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亨利·杜南(1828-1910)》，网址：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misc/57jnvq.htm。

建设，已经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应对人道紧急局势以及处理武装冲突遗留问题方面的一项独特竞争优势。确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备法医能力，并将其专门用于人道目的的人道组织。也正因为这样，委员会如今在人道法医行动方面是公认的权威。

因此我深信，2018年全新启动的失踪人员项目将进一步巩固法医从业人员的作用，夯实法医学为预防和处理失踪人员案例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事实上，该项目的启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新契机，让我们可以吸取2003年以来相关工作的经验教训。它旨在动员全球范围内从事法医学实践工作的专业人员和机构，为其赋能，并制定新的标准和指南以应对新的挑战（如失踪移民问题等），从而有效应对世界各地人员失踪的悲剧。

在我看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加以发展，也就是将法医学直接用于针对生者的相关工作中。我认为，这项工作会逐渐成形，符合当今世界对人道行动的要求和期望。例如，在为据信遭受虐待的被拘留者开展干预行动时，应听取法医专家的观点，以证实被拘留者的主张。这并不是说，此类主张在没有法医专家意见支持的情况下就不应认真对待，但通常只有法医专家才能够提供有利于受害者的必要循证论据。渐渐地，人们必然会日益认识到法医学也可以帮助生者，如记录酷刑和性暴力。以性暴力问题为例，我就曾经参与制定部分标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这些标准非常有用。其中一例涉及贞洁测试；我们一直在努力驳斥这种测试在科学和伦理上的合理性，因为它可能构成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¹⁰

总之，人道法医行动如今已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项重点行动。最初，它只是一种技术和科学工具，但其必要性与日俱增，不仅对一线行动十分重要，而且对进行人道对话，以及使委员会成为人道援助领域的领军机构也具有重大意义。

就我个人而言，协助创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医部门与协助创建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团队一样，都对我的职业生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毫无疑

10 Independent Forensic Experts Group, “Statement on Virginity Testing”, *Journal of Forensic and Legal Medicine*, Vol. 33, 2015, available at: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2928X15000335.

问，这两支团队都有助于拓展法医学的应用范畴，分别将人道与人权维度融入法医学之中，可谓史无前例。我非常感谢所有与我共事并帮助我取得上述成绩的同事们。在此，我也必须向我的家人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多年来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解和鼓励，我才能够为这项共同的事业贡献必要的时间与精力。

人道法医行动的发展无疑将有助于人道界进一步理解法医学对其活动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有助于法医界理解自身对人道活动的重要性和价值。美国法庭科学学会已于2015年设立了人道和人权资源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在您的职业生涯过程中，人道法医工作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科学层面来讲，您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人道法医行动的定义是将法医学应用于人道行动，这实际上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辟的法医学新领域。多年来，这一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最初，法医学只是被看作一项工具，主要帮助确定死者的死亡原因和方式。而无论死者身份是否已经得到确认，都需要首先保护他们的尊严，并妥善记录遗体信息，以便于身份辨认，使遗体可追溯，这一概念是随着时间流逝才逐渐得到了认识与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的工作。因此，人们对法医学知识和活动领域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最初认为法医学领域主要或完全侧重于找回死者遗体，以确定其死因；后来认识到法医学主要是要保护死者的尊严、进行专业的记录并帮助死者家属查明真相。后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上报情况，还需要直接参与对话，满足失踪人员或死者家属的社会心理需求。¹¹

¹¹ 如欲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见本期《评论》保利娜·博斯的文章。

您经常需要进行失踪人员遗体身份的辨认工作。您认为这项工作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与标准的刑事侦查不同，处理失踪人员案例的调查，无论他们是否在世，都能够帮助失踪人员家属克服一些最难承受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家属无法知晓失踪亲人的下落和命运，也无从得知亲人是生是死。如果发现失踪人员已经死亡，就必须确认其身份，并告知家属，这样他们才能够开始悼念亲人——这一点只有通过法医学才能做到。同样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都要确保死者的尊严得到保护，在这一点上，事实也证明法医学不可或缺。

换言之，帮助处理失踪人员的案例，为法医工作赋予了真正的独特人道意义。此外，在此类调查中遇到的具体挑战，包括大规模的复杂遗体找回与身份辨认工作，也为在推动人道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法医学提供了机遇。

您如何确保在开展此类工作时始终以死者及其家属为核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几个不同的角度可以考虑。从纯粹实用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死者的相关信息，就无法辨认一具或一组人类遗体的身份。这些信息我们称之为生前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最佳来源，通常也是唯一的来源，就是死者家属本身。出于这一原因，作为调查失踪人员，并力图辨认死者身份的法医专业人员，我们需要和有关家属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让他们能够信任我们。

然而，在人道行动中，这已经超越了纯粹实用的层面。开展人道法医工作，不仅意味着家属在协助身份辨认方面至关重要，还意味着家属对我们的辨认结果是信服的，相信他们失踪的亲人就是我们告知的那个人。要实现这一点，法医学就需要与家属进行对话，建立信任，工作时不能脱离家属。始终与家属保持密切沟通对开展法医鉴定至关重要，对人道法医行动而言就

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在与死者家属进行沟通联系的过程中，采用一种高度专业和共情的方式。所谓共情的方式，就是要真正站在家属的立场上感同身受，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观点和想法。作为一名医生，我想说，这需要我们与死者家属之间建立起一种准治疗关系，鼓励他们以家属的身份积极地参与到调查过程中，同时确保无论调查结果如何，他们都能予以信任。我希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新启动的失踪人员项目能够协助进一步制定相关指南和标准，帮助从业人员与死者家属进行对话，并且有助于确保此类对话在实现处理失踪人员案例的人道目标时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您工作中遇到过最具挑战性的情况是怎样的？

说到挑战性的情况，就必须提到早期我在阿根廷参与的工作。那个时期，阿根廷的军事政权刚刚覆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看到针对已犯下的罪行进行调查而深感不安，仍然有人不希望相关案件受到调查。这就会导致我们在工作中遭遇到一定程度的危险和威胁，有时甚至十分严重。我很早就经常与同事和朋友们讨论是否应该继续开展此类工作，因为我已成家，而威胁又十分严重，所以我必须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们那时都只是学生，背后没有任何网络或机构可以保护我们。后来，为五月广场祖母协会工作帮助我们。祖母们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慰藉，因为她们一直以来也遭遇威胁，经受了多年的严厉打压。这令我感到十分宽慰，因为如果她们都可以承受并克服这些挑战，那我们也可以。

除了在我职业生涯早期面临的这些艰难局面外，我认为还有大量具体的挑战是所有法医从业人员在一线开展人道法医工作时都会面临的。例如，我们需要在行动中应对史无前例的情况，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中还会面临实实在在的生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产生疑问，质疑为死者工作是否值得自己冒生命危险。就最后一点来说，我的回忆大部分都与我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的一线工作密切相关。

例如，在2011年，我们接到任务，需要帮助找回在利比亚被绑架并杀害的35名男子的遗体并确认他们的身份，而当时的利比亚内战正酣。¹²这项行动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当地社区的全力支持下在一线现场开展，当时正值斋月期间，是内战的关键时期。有趣的是，社区告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找回死者遗体，比委员会目前提供的任何其他援助，包括救治战伤员，都更加重要和紧迫。事实上，周边地区枪击不断。尤其是有一天，有报道称大规模的武装分遣队正来势汹汹，意图夺取该地区的控制权并清除附近的所有人，因此我们不得不逃离现场，什么都没来得及带，直到确认报道不实后才返回。这种情况对法医工作者来说是极富挑战性的，一方面，你必须尽可能专业地开展法医工作，而这需要遵循特定方法、满足相关标准，并且有时间限制。另一方面，又需要将行动需求相关的风险降至最低。因此，必须要达成平衡，同时还要尽可能遵循相关程序和标准，始终为家属着想，最终服务于所开展工作的人道目标。最后，通过五个工作日不眠不休的工作，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而在正常情况下，同样的法医工作至少需要两倍规模的团队用三倍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令我感到满意的是，在35具遗体中，我们确认了其中27具的身份，使用的是我们日常遵循的方法和程序，符合我们自身的标准和四个《日内瓦公约》关于管理、记录和辨认战争死难者的一般要求。这也满足了社区的主要关切和要求，即找回失踪人员的遗体并确认他们的身份。此类局势显示出，在极富挑战性的情况下应如何相应调整法医程序，并运用适用的技能。这是我们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时常常会遇到的情况。

此外，法医工作还会面临其他类型的挑战，首当其冲感受到极端的政治压力。关于这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2008年7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到请求，需协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换战俘和遗体。¹³这场战争爆发于两年前，当时有一支真主党小分队穿越边境，俘虏了以军两名士兵，而

12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利比亚：帮助辨明死者身份》，新闻稿，2011年9月14日，网址：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news-release/2011/libya-news-2011-09-14.htm。

13 See Ayat Basma and Avida Landau, “Hezbollah Delivers Remains of Two Israeli Soldiers”, *Reuters*, 16 July 2008,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israel-lebanon-prisoners-idUSL141960220080716. See also Anna Petrig, “The War Dead and Their Gravesit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1, No. 874, 2009.

以色列予以了反击。历时两年时间，双方才在中立国首席谈判员的调解之下，就交换战俘和士兵遗体达成协议，并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担任中立调解人。真主党将归还两名以色列士兵，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战俘并归还巴勒斯坦死者的遗体。然而，两名以色列士兵生死未卜。这对于两名士兵的家庭、两个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我碰巧身在黎巴嫩，开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另一项与此无关的失踪人员法医评估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黎巴嫩代表处主任问我能否留出一些时间，以医生的身份对两名以色列士兵进行检查。如果他们依然在世，我就要检查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记录他们可能受到的任何伤害等等。如果他们已经死亡，我就要对其遗体进行必要的检查。这项工作起初看似简单，后来却变得极其敏感和困难，因为出现在检查现场的是两具棺木，据称里面安放着两名以色列士兵的遗体。我接到了首席谈判员提出的要求，他表示除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证据，证明两具遗体的身份，否则以色列方面不会有任何行动。

当天，我只带了一些手术手套和进行体外体格检查的基本用品，却突然被要求对遗体进行全面的法医鉴定，而且还没有任何死者的生前信息。这令我倍感压力；而如果经鉴定，遗体并非那两名以色列士兵，双方必将出现进一步的紧张局面。首先，我表示自己会尽最大努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事实上也别无选择。其次，我提出了一些条件：现场不得有媒体，因为为了保护死者的尊严，相关检查需在私密条件下进行。我要求检查现场只留下我、谈判员以及协助我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事，其他人员不得打扰。经过一番讨论，他们终于为我搭起一个小棚子，可以让我在完全私密的环境中打开两具棺木。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在边境的另一边，战俘等待着转移，载有待转移遗体的卡车在等待，武装部队也在待命。

此前，我已经要求提供两名士兵的生前信息——我需要身体信息，包括一些牙齿信息，以确认这两具遗体是否是那两名士兵。在最后关头，我终于得到了进行牙齿X光检查的仪器。我打开了棺木，又因为认识到根据宗教诫命，要尊重死者的尊严，所以我不能破坏遗体，只能进行有限的法医分析。在对遗体进行检查后，我迅速得出结论，证实了他们的身份，因为我在遗体上看到的牙齿特征与以色列方面发送的两名士兵的牙齿图像完全吻合。这

样，我就能够在现场写出简明扼要的报告，确认两具遗体正是以色列的那两名士兵。报告完成的那一刻，各方都松了一口气。在鉴定工作完成约四小时后，首席谈判员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医专家在四十五分钟内成功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医团队需要四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的任务。这是我从业以来获得过的最大的职业荣誉。你们可以想象到，这次行动的挑战是多么艰巨。它并不涉及人身威胁，但一旦有所差池，就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法医工作面临的挑战还可能来源于自然环境。200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波哥大代表处要求我协助找回11名立法者的遗体。这些立法者于2002年遭到主要游击队的绑架，并在几个月前死亡，而死亡原因颇具争议。¹⁴游击队声称立法者死亡是由于政府军营救不利，而政府方面则直接指控是游击队将其处决。遇难者家属希望能够找回亲人的遗体。于是，经过长时间的复杂谈判，双方同意停火几天，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收集遗体。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需要乘坐直升机飞到丛林的中央，条件是游击队要在飞行过程中向我们提供遗体所在的坐标位置。我们最终降落在了一片古柯地之中，最初以为仅需一两天的任务将近一周才完成，我们只好在那里自力更生。没想到的是，游击队提供的精确全球定位系统坐标与我们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读数不符。有时候的确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于是我们更换了系统。但事已至此，我们必须在丛林中行走数天，穿越数十英里非常危险的雷区，试图找到正确的埋葬地点，与此同时，我们背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政府方面开始指责游击队撒谎，而游击队却予以否认，并且向我们保证遗体就在他们提供的坐标位置。在夜里，我们听到附近发生了几次爆炸，这表明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最糟糕的是，这次任务对我们的体能极限提出了巨大挑战，因为我们必须在热带雨林深处长时间盲目地穿行，才可能找到正确的埋葬地点。最终，我们利用从法医考古学借鉴而来的法医技术找到了那些遗体。一旦确定了埋葬地点，我们就必须对遗体进行妥善的发掘、记录并安全地将其运出埋葬地。事实证明，遗体发掘之后，将其运出埋葬地极富挑战。我们从最初的着陆点，一路

14 “11 bodies handed over in Colombia probe”, *Reuters*, 9 September 2007, available at: <https://tinyurl.com/yabda5py>.

穿过了茂密丛林和多个深谷，才最终抵达埋葬地，因此我们根本无法通过人力再将遗体原路运回。我们最终不得不在丛林中搭建起一个简易的直升机起降场，为此砍伐了多棵超过五十英尺高的树木。在我发掘遗体的同时，团队中的其他同事就在搭建这个比普通篮球场稍大一点的简易起降场。将遗体运回的这段航程还是很有趣的。

就更近期而言，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实施的人道项目计划在很多方面都极具挑战，挑战之一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执行类似任务的先例可循。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我们通常是支持法医行动，并协助已有的组织或机构，所以，以完全替代的方式规划并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又充满复杂挑战的人道法医行动，完全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尽管该群岛地处偏远、极端气候肆虐，我们还是在现场——也就是墓地——成功设立了一个高科技太平间，并进行运作，以确保必要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支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并按照计划遵循我们制定的规程。我们需要确保每一具遗体在发掘出来的当天完成分析、取样、报告并重新埋葬，整个过程要最大程度地保护死者的尊严，包括在重新埋葬时使用新的棺木——我们还要确保在所有任务完成后将墓地恢复原状。对我个人而言，管理一支规模庞大、技术高超的法医专家团队，并确保整个任务过程中一切顺利、和谐并最终达到所要求的标准，是非常富有挑战的，但同时我也收获颇多。请注意，我们是全体人员都在那样的条件下每天从早到晚，一周将近七天，一连工作了近三个月。幸运的是，我们是一个由高度敬业、勤奋努力、经验丰富的法医科学家组成的杰出团队，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对法医工作充满热忱。到最后，我们整个工作团队真的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大家庭。本次法医行动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次任务根本无法完成），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还有伦敦和巴西利亚代表处的许多同事也付出了辛勤劳动，提供了长期支持，在整个行动期间都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我认为，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看似无法克服的挑战，我们能够按计划完成整个项目，还是非常幸运的。最终，此次行动取得圆满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确认了这些死者的身份并且相应地通知了他们的家人，从而实现了亨利·杜南也会引以为豪的人道目标。

请您向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您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工作的相关情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如何得到授权，开展此次行动的呢？

总体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此次行动的授权要追溯到2012年阿根廷政府提出的请求。1982年，在阿根廷和英国的武装冲突期间，有一些阿根廷士兵遇难，之后不久就被埋葬在达尔文的一个军人公墓中。尽管英国军队当时已经尽力确认所有死者的身份，但仍有许多士兵的身份未得到证实。于是阿根廷政府请求我们帮助确认无名阿根廷士兵的身份。阿根廷政府授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此次行动，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一方面来自阵亡士兵的家属，他们希望自己亲人的身份得到辨认，并想确切地知道自己的亲人究竟埋葬在哪个坟墓。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四个《日内瓦公约》，根据其规定，冲突各方有义务尽最大努力确认战争死难者的身份。¹⁵

重要的是，能接到这一请求和授权，是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医能力的认可，因为如果我们不具备这种能力，阿根廷政府也无法授权我们开展这项行动。事实上，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早直接从政府得到的对其创新性法医能力的一次明确认可。我们这里所说的“授权”，在当时是通过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来进行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此次行动事关两个国家：阿根廷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磋商，最终达成了正式授权，制定了人道项目计划书，三方于2016年12月正式签署生效。根据授权内容的特别要求，本次工作必须严格以人道目的开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就此制定行动计划，并在2017年底前完成全部工作。我的任务就是为找回和辨认死者遗体的相关法医工作制定这一行动计划。因此，你可以说这次行动的授权来自于死者家属的要求，来自国际人道法义务，来自两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以及各方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和认可，认为只有委员会才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事实上，没有其他组织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并同时保证所要求的中立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尽管武装冲

¹⁵ 编者按：相关义务见《日内瓦第一公约》第15条至第17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2条、第34条；《第二附加议定书》第8条（关于搜寻和收集遗体）。

突早已结束，两国现已和平相处并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但这项行动依然非常敏感，要求在行动全程都始终保持绝对的中立，而这只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能做到。

人道项目计划取得了什么成果？家属是否得到了期待的答案？这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人道项目计划规定的时间之内，即2017年1月至12月，发现并找回了122具埋葬在达尔文的无名阿根廷士兵遗体，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当年的武装冲突中，阿根廷的作战失踪人员共计148名，而这122具遗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还有一些作战失踪人员从未找到，因此也没有埋葬于那个公墓中。我们设法根据自己规程的要求对所有遗体进行了记录，并按照人道项目计划的规划和要求重新埋葬回原位——也就是在遗体发掘的当天就要完成这些工作，同时还要在全程保护死者的尊严——经过分析，我们获得了每一具遗体的完整DNA档案。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从对应的家属那里获取必要的死者生前信息和参考DNA样本，那么我们就可以确认每一具检查过的遗体的身份。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因为并非所有死者家属都及时向我们提供了确认遗体身份所必需的信息和样本。

截至人道项目计划结束时，共有107户死者家庭向我们提供了DNA检测所需的死者生前信息和生物参考样本。在人道项目计划规定的时间内，我们最终完全确定了88具遗体的身份，并向其家属提供了相应的报告。此外，我们还告知10个家庭，他们的亲人未出现在我们分析的这122具遗体当中，也就是说他们的亲人没有埋葬在那个公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发布了所有尚未确认身份的遗体的报告，包括对应的DNA档案，以便未来阿根廷当局在收到相应家属提供的必要信息和参考样本之后可以确认遗体的身份。这其中包括由于所提供DNA样本未达到人道项目计划设定的99.95%的身份确信度，而无法确认与死者存在亲属关系的家属。

我们将报告提交给了两国政府以及家属之后，进一步打消了某些家属的顾虑，他们认识到我们的工作程序既严肃又专业，并确信向我们提供相关信息和样本是值得的。自2018年年初以来，又有新的家属前来提供信息和样

本，于是又有新的遗体身份得以确认。在未来，我期望我们分析过的遗体至少能有大多数得到身份确认。

此外，我们在对遗体进行法医检查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少量个人物品。这些发现是一个惊喜，但我必须在现场就如何处理这些物品做出决定，因为人道项目计划中并没有关于如何处理死者遗物的条款。在这些遗物中，有些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如身份证，还有婚戒等特别私人的物品。此前，收集死者遗体的英国方面曾向我们保证，他们已将所有个人物品移交给了阿根廷。然而，有的物品藏在了士兵身上厚重的冬装里，因此他们未曾发现，这也在所难免。我们能够找到这些遗物，是因为我们对遗体进行了全面的法医检查，还使用了上一代成像设备。由于遗体必须在发掘出来的同一天重新埋葬到原来的墓地中，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就如何处理这些物品进行耗时长久的商讨。因此，我根据四个《日内瓦公约》(对这一问题有明确的说明)的规定做出决定，我们将保留这些物品并将其交给冲突双方。¹⁶后来我们的律师也完全赞同这一决定。根据国际人道法规定，这些物品应归还给相应的家属。

令人高兴的是，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终提交的结果，全体家属都感到非常满意，即使部分家属并没有找到亲人，但他们也非常感激我们为其亲人所做的努力。起初，我以为某些家属会质疑结果，还有点不敢相信所有家属都对结果满意。但幸运的是，事实证明我错了。例如，最初，某个家属委员会的负责人就对本次行动报以严厉批判的态度，并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资格提出质疑。然而，这位负责人的母亲却想配合我们的工作；她认为她的儿子就埋葬在达尔文的公墓中，希望我们进行身份确认，并向我们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和参考样本。后来，在我们分析的遗体中，的确发现了她的儿子，我们就相应告知了家属；并将遗体随身携带的一些个人物品一并转交。家属对此非常感激。事实上，那位负责人最后也为她之前的言论公开道歉，并力劝其余家属都前来提供相关信息，捐献参考样本，以帮助确认埋葬在达尔文的亲人的身份。

16 编者按：见《日内瓦第一公约》第16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19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2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39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4条第2款第3项。

最后，所有相关家属无一例外地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反馈。2018年3月26日，家属在达尔文公墓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悼念他们的亲人，并为每一座坟墓献上了花圈。在我看来，这个肃穆而宏大的纪念仪式一方面证明了缅怀死者的重要性和人道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确切知晓亲人的安葬之处对于死者家属的重要意义。为了这一刻，他们四处奔走，足足等待了35年之久。

您认为，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吸取哪些重要经验呢？

首先，这次行动证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能力在富有挑战性的情况下开展高度复杂的遗体找回和身份辨认的法医工作。最初，很多人都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或者是否应该以我们所说的法医工作的“完全替代模式”来开展此次特殊行动，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整个过程全权负责，包括出具最终的身份证明报告。本次行动证明，面对这一类极富挑战性的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标准、规程和体制、必要时还可调用专家网络，将他们聘任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案例证明，如今的法医学可为解决复杂的人道问题提供多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此外，本次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法医学相关经验，包括如何进行身份确认的经验，尤其是突显出了“综合鉴定法”的重要价值，也就是要在法医身份确认过程中，综合考虑所有可用信息——包括死亡地点、可获得的生前信息和DNA测试结果等。这一概念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医服务部和法医顾问理事会提出的。¹⁷例如，有些人无法理解我为何要求提供这些士兵的死亡地点信息来协助进行身份辨认。他们认为我们只需要通过DNA测试就可以得出结论。然而，这些士兵的死亡地点信息其实非常有用，因为英国方面已经准确记录了发现遗体的地点。因此，如果英国方面提供给我们的遗体地点信息与某士兵的推测死亡地点信息相匹配，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缩

¹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医顾问理事会成立于2010年，旨在为委员会就开展人道活动可能涉及的复杂法医问题提供建议。该委员会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名不同学科的著名法医学家组成，他们自愿为委员会提供建议。

小这名士兵的身份假设范围。事实上，从法医的角度来看，DNA测试无法为每个受检样本都提供确定的答案，我们常常需要一些附加信息才能够确定地得出最终的鉴定结果。我们得以利用死者家属提供的生前信息，这些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我们开展辨认工作，但往往也不足以得出最终的鉴定结果。事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综合鉴定法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吸取了重要经验，用于开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新的下一代生前-死后信息数据库，包括实现多用户协同工作，对法医信息进行实时记录和管理。这已经有助于激发我们关于新数据库建设的想法，并且正在付诸实施。

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的角度来看，这次行动彻底颠覆了委员会一线行动的标准模式——即总部给予指导，代表处负责实施，而是由总部直接派驻团队到一线地区，并由相关代表处予以支持，真正实现了所有相关人员的共同参与。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案例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再次证明了死者对其家属、社区和国家的重要性。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阿根廷与英国目前已和平相处并且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但这个问题依然颇具争议。虽然这次行动的目的可能并非让死者安息，但它却是两国之间建立信任的关键一步。

失踪人员问题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核心关切之一，也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然而，在这个案例中，那些无名士兵可以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失踪人员”，因为大多数家属都知道他们的亲人已得到妥善的埋葬，正安息在那片群岛之中。然而，家属们需要知道更多；他们需要确切地知道亲人的葬身之所，尤其是，他们希望把姓名还给逝去的亲人。这个案例再次证明，死者家属需要知晓亲人的命运，需要能够在亲人确切的安息之地献上花圈，这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国际人道法做出这些规定并非偶然。

顺便提一下，这个案例也证明了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长远价值和存在的必要性。否则，那些阵亡士兵的遗体首先根本无法得到妥善的收集和埋葬，人道项目计划也就无法开展。国际人道法关于死者问题的确切规定还对我们此次行动的法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找回死者个人物品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作为普通大众，应该如何理解法医工作在人道行动中的作用？

诗人威斯坦·休·奥登 (Wyston Hugh Auden) 曾写过这样一句话：“通过艺术，我们可以和逝者共进一餐，而如果缺少与逝者的交流，是不可能拥有完整的人生的。”如果我们将“艺术”替换为“科学”，把“人生”替换为“人道行动”，这句话则变成“通过科学，我们可以和逝者共进一餐，而如果缺少与逝者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人道行动的”。通过这句话，可以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法医学对于人道工作的重要性。再强调一次，法医工作不仅关乎死者，也同样关乎生者，因为我们与死者息息相关，我们为死者工作时，也同样在为生者工作。死者家属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但法医工作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它会触及人性的内核。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于2018年启动了全新的失踪人员项目，旨在协助制定新的指南和标准，用于预防和处理失踪人员案例。因此，我希望这一新项目可以进一步结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实施人道法医活动中获得的大量经验，包括从去年的人道项目计划中获得的经验，以便保障死者的权利、查明失踪人员的下落，并帮助相关家属实现自己的权利。